

清华舞蹈队，我们成长的家

○楼叙真（1966届电机）



一九六三年楼叙真演出
斯里兰卡舞蹈《罐舞》

中学时候我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。1960年，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，入学后参加了新生文工团，之后就参加了校舞蹈队，大一下学期成为集中队员。1962年10月，胡昭广从舞蹈队调任校学生会副主席，我接替他担任舞蹈队团支部书记，一直到1965年8月去“四清”。那时清华文工团（后改为文艺社团）的骨干，都集中住在一起，党团关系也在文工团，上课时候回班，大六时才回班住。由于我大六时和文工团一同去“四清”，参加“四清”文艺宣传队的工作，所以从1961年一直到1968年离校都住在文工团里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队员。

我1960年进校时，正值经济生活困难时期，粮食不够吃，很多同学都浮肿。系里号召我们“劳逸结合”“多睡一小时，少吃一两饭”，我们又是一年级新生，班里气氛比较沉闷，而集中队员那里依然朝气蓬勃，我很向往成为集中队员。那

时我们非集中队员，每周在集中队员住的16宿舍前活动，感到很愉快。记得我参加排练的第一支舞蹈是《东北大秧歌》，当时宋均一边大声喊着鼓点，一边带着我们练“五鼓”，大家兴致勃勃，满头大汗，一点也没有困难时期那种低沉气氛。团支部书记胡昭广还组织集中队员养兔子、种菜，精神面貌和班里大不一样。这一切使我深受触动，我渴望加入这个集体。

要成为文工团的集中队员，必须品学兼优。集中队员的学习成绩明显高于全校平均水平，如果队员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就要回班，学习成绩好了可再归队。这就要求我们学习、活动两不误，该活泼的时候就活泼，该学习的时候就能坐得住。舞蹈队里的学习风气非常好，大家都刻苦认真。当时学校在每个班（30人）选一两个尖子“因材施教”，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加修一些课程。舞蹈队的因材施教生比例高多了，我记得二十几个集中队员中，胡锦涛、范锡莉和我都是因材施教生。毕业时陈清泰、胡昭广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奖章，魏熙照、黄辰奎和靳东明等获得毕业生优良奖状。

舞蹈队里高班低班、不同系的同学住在一起，相互熏陶感染，思想活跃、积极向上。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国家经济困难，中苏关系恶化，苏联又撤走专家，同学们的思想情绪十分压抑。有一次我和团支部副书记胡锦涛组织支部活动，讨论人生。陈清泰说，我们决不能人穷志

□ 荷花池

短马瘦毛长，眼前的困难不能动摇我们的精神和理想。他说我们能上大学是以90%以上的同龄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；我们能进入清华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。二十或三十年后，我们中理应成长出工程师、厂长、校长、部长。不是你、不是我，也许就是他。这不是自傲，而是清华学生的社会责任。当时大家听了，兴奋异常，深受鼓舞。仔细想想，也就是这么个理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他的话得到了印证，我们舞蹈队里不仅出了专家、部长、市长、厂长、院长，还出了国家领导人。很多人在业务上卓有成绩，个个都是有用之才。

蒋南翔校长曾说过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华地下党学生的比例是10%，现在解放了，清华学生更好地接受了党的教育，党员比例不应低于解放前。所以，清华历来重视发展学生党员。但是遇到家庭出身不好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，在系里入党就比较难。校文工团政治上积极向上的氛围比较浓厚，离校团委和党委比较近，在政策把握上可以得到团委和党委的



1964年舞蹈队集中队员中的阳光女生。左起范锡莉、王新声、苏文漪、翁其美、刘筱楨、徐萍、袁莹、尹婉秀、赵晓阳、竺新源、王丽珍、楼叙真

直接指导。遇到不好处理的情况，就直接找团委和党委汇报解决。因此，在文工团入党的比例比班里高，胡昭广、胡锦涛、靳东明、王丽珍、王少勇、吴国蔚、薛锋、高学江和我都是在舞蹈队入党的。

舞蹈队这个集体团结温馨，互助互学。我在清华的这段时间里，政治运动很多，但是我们从来不扣帽子，不打棍子，对所谓“后进”的同学热情帮助。当时我虽然任团支部书记，但我的偏好是舞蹈业务，经常和队长靳东明等同学一起创作、编导、排练一些新节目，团的工作胡锦涛就管得比较多。他经常和队员们谈心，遇到队员有“思想疙瘩”，他会耐心为他们疏导。每逢寒暑假，我总要给回泰州的胡锦涛写封信，请他把团支部总结写好。胡锦涛不仅字写得漂亮，而且总结写得也有血有肉，能充分体现我们这个集体的风貌。1965年，我们舞蹈队被学校评为“四好集体”——身体好、思想好、学习好、劳动好。1964年9月就要毕业的五字班（1959级）的集中队员大都回班住了，而胡锦涛由于学习好、工作出色被选拔为学生辅导员，仍留在文艺社团，出任文艺社团团长。

1965年11月，我正在延庆参加“四清”，奉命回校。胡锦涛给我们布置任务，为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30周年，北京市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演出，清华演出最后一幕“支持世界革命”，由我担任总导演，已毕业留校的老队长靳东明任主要舞蹈部分的分导演，群众演员部分又设了若干分导演。我们边编边导，除了舞蹈队队员外，还动员了各系的群众演员共300多人参加演出。我们班的同学看到我在台上指挥若定，十几个编



新清华学堂奠基仪式上和母校领导、老师、校友嘉宾合影。左起：殷勤藻、陈清泰、楼叙真、郑小筠、王大中、贺美英、贾春旺、胡昭广、韩景阳

导、几百人的大歌舞组织得井井有条，感到很惊讶，说我这些年变化太大了。是的，舞蹈队培养了我们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，锻炼了我们的工作能力。清华舞蹈队，我们成长的家。

我们六字班（1960年入学，1966年毕业，因“文化大革命”1968年才离校）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第一届毕业班，毕业时学校一片混乱，没举行毕业典礼就人走楼空了。1996年校庆是六字班毕业30周年返校日，学校要为六字班补办一个像样的毕业典礼。在典礼上，我们清华舞蹈队的老队员（平均年龄55岁）演出了《鄂尔多斯舞》。一出场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我们合着掌声跳完了。我和谭又亭回到班里，同学们说我们是流着眼泪看你们跳舞的，舞蹈队的人仍然像当年一样年轻洒脱，充满朝气。之后我们在2011年100周年校庆时，在全校庆典晚会上又跳了《鄂尔多斯舞》，当时我们平均年龄是70岁。2018年，为庆祝文艺社团建团60年，已完成新老交接的清华校友舞蹈队，在年轻队委会的领导下奉献了一台美轮美奂的舞蹈专场——“向美而行”。参加演出的校友舞蹈队员有90余名，最年长的81岁，

最年轻的20岁，相差一个甲子。我们老舞蹈队员的演出生涯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我从18岁进清华到现在79岁，好像从未离开清华舞蹈队。在校期间受到舞蹈队团结向上、勇往直前的气氛的熏陶，形成我热情乐观的性格。毕业时我主动要求分配到“三线工厂”——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。二汽在鄂西北偏僻的山区，工厂还在筹建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。我的大女儿1970年出生，没有牛奶，连奶粉也要托人在大城市买，常常接不上。我们就用炒面粉、豆粉加少许奶粉给孩子吃。我们住在山上，早上要赶公交上班，为了防止下山时摔跤，我把孩子装在一个大袋子里绑在身上，等车时我把布袋当长鼓，跳起了朝鲜族舞蹈长鼓舞。周围人都笑了，“楼楼，真服你了，再苦的日子你也能活出彩！”

1985年我担任二汽技术中心主任，技术中心有2000多人，下设汽车设计、汽车工艺、材料、计算机等多个处室。清华舞蹈队培养我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有了用武之地。我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不是学汽车的，技术中心各个专业都有能人、学术带头人，虽然是主要领导，但我把自己定位为“Interface”，是各个专业的“接口”。我们按照厂里“开发一代、预研一代、改造一代”的工作要求，从卡车设计向轿车设计研发扩展，为上轿车做技术准备。1987年国务院同意二汽引进外资开发生产轿车，二汽与外资谈判开始，我也参与了谈判工作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极力主张把技术中心的各学科的人派往国外公司学习，日本富士重工公司采纳了我们的